

陕北方言性别歧视现象分析

白虹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榆林学院,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可以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陕北方言生动地再现了陕北文化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陕北文化社会生活。本文从陕北方言存在的性别歧视入手剖析其存在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陕北方言;婆姨;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H1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94-02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和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征。^①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与女性相比,男性一直居于支配的地位,而女性则是处于从属地位,是备受歧视、被压迫的对象。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女性总是生活在男性的掌控下。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会体现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语言的性别歧视。因此,可以这样说,社会性别歧视是语言性别歧视的根源。

一、语言性别歧视概述

性别歧视是指一类性别成员对另一类性别成员所持有的偏离了事实依据的看法和态度,^②既指对女性的歧视,也指对男性的歧视。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曾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可见,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语言中。汉语的性别歧视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其一,语言以男性为规范,女性语言是在作为主体与标准的男性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如人们习惯用“他”或“他们”指代性别不确定的人或用于泛指某人或某一类人。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他”是老字号,“她”是分店。^③汉语中指代妻子的称谓有许多,如“张家的”、“屋里的”、“张氏”、“孙家婆姨”。从这些称谓中可以看出,在汉文化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其二,汉语中女性词语一般趋向贬化发展,具有消极意义。如汉语中的“女强人”,虽其字面意思指专注事业并获得成就的女性,但“女强人”这样的称谓太过生硬,忽略了女人的特质,失去了女人本身的性别魅力。同时“女强人”也隐喻那些事业成功、情感生活失败的女性。其三,男先女后的词序也反映了汉语的性别歧视。如汉语中的男女、夫妻、公婆、父母,夫唱妇随,男尊女卑,男耕女织、男欢女爱。这种男先女后的词序原则还影响到与动物有关的语序排列,如公母、鸳鸯、龙凤等。^④例如,人们对凤凰的理解,人们觉得凤是雄的,凰是雌的,因此就有了“凤求凰”的典故。汉语性别歧视充分地诠释了帕尔默所说的那句话:“(语言)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

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

二、“婆姨”一词所反映的性别歧视现象

汉语的性别歧视充分地体现在夫妻称谓词中,表达了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是男性附属的意义。陕北方言中“婆姨”一词就是这类称谓词的一个典型,它既指老婆、妻子,又泛指已婚女人。从字面上看,“婆姨”一词恰好反映了汉语以男性为规范和男先女后的词序,男性语言是婆姨一词形成的主体与标准。“婆”字在前首先确定了女子的身份即某个男子的妻子,“姨”在后则表明娘家姊妹,在娘家当姨。陕北女子结婚后就失去了娘家的姓以及自己的名,只得随夫姓,成了张家的婆姨或是李家的婆姨了。例如,马可《夫妻识字》:“刘妻:有人问我是谁,我就是刘二他婆姨。”^⑤从中可以看出,“婆姨”一词充分表明了女性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是男性的附属,是男性的附属品。不仅如此,“婆姨”一词还带有贬义,专指那些在家操持家务、侍奉公婆和男人、当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任劳任怨并且现成拿来当老婆的女人。例如,“好菜费饭,好婆姨费汉”;葛洛《卫生组长》:“婆姨养娃娃,到牲口圈里去养。”^⑥除此之外,陕北方言中的“婆姨”一词还是没文化、没修养、没品位,头发长见识短的代言词。例如,在家族议事中,女性是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的。如果有女性开口说话,那么男人们就会说“婆姨女子懂个甚,站一边去”;“婆姨女子的话,你也信”;或是“婆姨女子别插手我们男人的事”。可见“婆姨”这一称谓是相对于男性称谓而言的,带有轻视女性的意味,表明了女性卑微的性别角色,反映了女性大多处于男性世界的从属和边缘位置,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陕北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以及“夫为妻纲”的道德观。

三、性别歧视的深层因素

正如戴庆厦所阐述的,“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别、男女的社会分工和文化角色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制约”,这三个方面是语言性别歧视的深刻根源。例如,“男尊女卑”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残留的不平等现象,社会分工差异也是趋向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同时,人们对男

性与女性所给予的期望也是不同的。

“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决不会造就歧视妇女的词汇。”^⑦因此,陕北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是造成陕北方言性别歧视的深层根源。自古以来,陕北高原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地处偏远且信息闭塞,世代代的陕北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艰难求生,需要超越一般的毅力和强健的体魄才能对抗险恶的环境。陕北男人为了生存常年在外辛苦打拼努力撑开一片属于自己和家人的天,而女人则在家侍奉老人,养育孩子,操持家务。因此,在以农耕为生产方式的情况下,男人比女人有着更多优势,发挥着更大的支撑作用。正是这种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使得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着不同的期待,因此两性地位进一步分化,逐渐形成一种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观念。虽然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汉文化所具有的,但是由于陕北人民“一直生活在边远的穷乡僻壤之地,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造成思想意识上很强的保守性”,^⑧所以性别歧视在陕北文化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一些,陕北方言中的许多词语以及陕北民歌便是这种意识的多维折射。

经济原因是造成陕北方言性别歧视的根本因素。“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妇女在经济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占着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群婚制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便逐渐形成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这时期的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上是主宰者。然而到了农耕的自然经济,人类就进入了父权制时代,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劳动分工使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继而女性丧失了其社会经济地位,由此也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失去了经济地位的女性必然要依附于男性,处于从属地位,进而女性成了无知、无能的代言词。“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陕北封建的宗族意识也是陕北方言性别歧视又一重要原因。宗族本身就是以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排斥和压抑,^⑨宗族尤其是以父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因此,它倡导的是族权与夫权。陕北人民从出生就被灌输着所谓男人是当家人、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女性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她们接受的都是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中国古代礼教,其目的就是让女性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奴隶。例如,“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遵从或顺从丈夫,而丈夫是一家之长,对妻子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再如,“三从四德”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父权和夫权,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从道德、行为、修养方面对女性进行的规范要求。“三从”即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中不难看出,“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言语行为及行为方式有着不同的期待和要求,这些期待与要求以固定模式的形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⑩这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活动领域和言语行为。

四、结语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正如沃尔夫森所说:“语言中的性歧视问题不是语言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讲语言的人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因此,语言的性别歧视不是基源于问题本身,陕北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女性低下的经济地位是造成陕北方言性别歧视的深层原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其语言性别歧视程度就越低,反之则亦然。综上所述,要改变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首先,女性必须拥有和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重新获得属于自身的独立人格,享有与男性在各个方面的平等权益。其次,人们也要摒弃过去落后的封建意识,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势,根除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最后,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教育力度,正确引导民众社会意识,努力消除语言中的歧视现象。只有这样,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才能逐渐地消失。

[注 释]

- ①李梦欣:《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中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159~160页。
- ②陈丛耘:《汉语的性别歧视》,《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05页。
- ③吕叔湘:《“他”或“她”》,见《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 ④高玉芬、任维平:《汉语中的性别主义及其根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99~100页。
- ⑤马可:《夫妻识字》,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
- ⑥葛洛:《卫生组长》,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 ⑧李小华:《客家方言中两性文化观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2期,第231页。
- ⑨刘泽华、杨志玖等:《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 ⑩林吉玲:《儒家女子价值现在近代的嬗变》,《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2期,第84页。
- ⑪赵慧珠:《封建宗族与妇女的地位》,《民俗研究》,1990年第4期,第62页。
- ⑫黄敏:《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08页。